

吳康齋的生活與學術

鍾 彩 鈞*

關鍵詞：吳與弼、明代理學

一、前 言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生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憲宗成化五年十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九（1392-1469）^①。

關於康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黃梨洲說：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婁諒，1422-1491）莊渠（魏校，1483-1543）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陳獻章，1428-1500）出其門，然自叙所得，不關聘君，當為別派。於戲！椎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明儒學案·崇仁學案序》^②）

* 本處研究員。

① 婁諒〈吳康齋先生與弼行狀〉，收於焦竑《獻徵錄》（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卷114，頁20-25，總頁5007-5010。洪武二十四年相當西元1391年，但康齋生於年底，已跨至1392年。但為了與舊有記載一致，本文對康齋年歲的計算仍以洪武二十四年（1391）為一歲。

② [清]黃宗羲撰：《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梨洲以爲康齋學說沒有創見，但有胡敬齋（居仁，1434–1484）、陳白沙兩大弟子。梨洲將胡敬齋列於《崇仁學案二》，視之爲正傳。婁一齋、魏莊渠稍爲轉手，陳白沙則爲別派，然而卻是明學進入精微的開始。萬曆十三年，詔以胡敬齋、陳白沙、王陽明從祀孔廟^③，再加上先前從祀的薛敬軒，則從祀的明儒四人中，康齋弟子佔了兩位，這點可印證康齋作爲啓迪者的重要地位。

當今學者對康齋的研究也著眼於他作爲明學前驅的地位，將他視爲明代前期朱學中的一員來著墨。梨洲說他一稟宋人成說，乃指他以心爲知覺，而不知心即理；以靜存動察爲二，而不識心是即體即用、即動即靜的。梨洲意謂其心說承自朱子，而未達到陳白沙、王陽明的高度。而當今學者則或強調他的推尊朱子，或從思想史角度指出他如何是朱子與陽明的中介^④。此外還有從明學證悟心體的特色來評價康齋地位者^⑤。

- ③ 參看〈從祀文廟疏議〉，《白沙子全集·附錄》（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43–47。
- ④ 主前說爲錢穆。錢先生雖強調康齋尊朱，但結論亦將康齋、敬齋與北方程朱學者薛敬軒（瑄，1389–1464）、曹月川（端，1376–1434）相比較，以爲相對於月川、敬軒的從朱子上窺濂溪、康節、橫渠，喜言天，多縱論宇宙自然理氣問題；康齋、敬齋則似由朱子上窺二程，喜言心，偏重日常人生以至治平教化。由康齋轉出白沙，由一齋轉出陽明。見〈明初朱子學流衍考〉，《中國學術思想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年），第7冊，頁1–19。後說有古清美指出明初朱學重視身心性情的特色，而成爲朱子理學向陽明心學轉變的環節，其中康齋由躬行實踐表現了「心與理一」的光明人格，給予明代學者深遠的影響和啓發。參看〈明代前半期理學的變化與發展〉，《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頁1–41。又有祝平次以爲康齋身上可以看到朱子思想內容的失落，但其重實踐力行，將整個理學重心收向裏來，對理學的發展確有重大影響。參看《朱子的理氣心性說與明初理學的發展》（臺北：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頁116–117。
- ⑤ 參看林繼平〈明代理學之前驅—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哲學詣境的探索〉，《明學探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林說提出「形上本體的實證」爲最高標準，以此評價諸儒所達到的高度，並不注重思想史的演變。他稱康齋爲「田園哲人」，是有見地的：「吳康齋與薛敬軒有一共同點，即都是程朱派的理學家，但其精神面貌與伊川，尤其是朱子，極爲不類。他愛從個人心地上做工夫，不似朱子之向外格物窮理，故

當今學者雖從不同出發點探討康齋之學，但都用〈日錄〉^⑥作材料這點是相同的，至多再引用一些論學書信。〈日錄〉記錄了康齋對聖賢之學與日常生活的體驗和反省，自當依此來探討康齋的思想，但康齋既然以日用實踐為特色，對他的生活、自修、教學有更多的認識是有益處的。本文便從其全集中勾稽材料，描繪其生活與學問各方面的相貌，以期能在更堅實的基礎上了解其思想。但康齋的生活與學問相當樸素，表現在全集中的和表現在〈日錄〉的差不多，因此本文對於當今學者的研究，是印證多於改正，然而在較多材料的支持下，對康齋的理解亦能更持平而不流於片面。

二、康齋的生活

(一)康齋的勤學

康齋志學勤篤，可以說自少至老，無一時一刻暫停。婁一齋云：

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強不息，日新程課。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行狀〉）

康齋從事農牧以維持生計，因此其志學勤篤須從其掌握餘暇，堅持用功之處見出。一齋描述康齋在旅途、工作及寢時也不忘用功，這裏先說其寢時的工夫。劉戡山說：「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明儒

見道最早。他擯棄世俗的富貴榮辱觀念，以田園哲人的姿態出現，而澹泊自甘，全然朝向孔顏之樂的思想道路發展。其哲學思想，盡表顯於個人日常家居生活中，開出生活哲學化的先例，在中國歷代哲人中，是極為特殊的。」（頁22）

⑥ 收於[明]吳與弼撰：《康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1。後引《康齋集》只注卷頁數，引〈日錄〉只注頁數及條數。

學案·師說》)此語說得悚動人心，參考康齋〈日錄〉及詩作，原來康齋有在枕上反省、甚至作詩的習慣，包括了就寢、夢醒、晨起、休養諸時。如〈日錄〉：「夜枕思宋太宗燭影事，深為太宗惜之。人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方做得堯舜事業。不然，鮮有不為外物所移者。學者須當隨事痛懲此心，剷割盡利欲根苗，純乎天理，方可語王道。」(頁1下，3條)「倦臥養病，思已往踐履及聖賢名教。臥起，天向暝矣。」(頁41下，326條)前條記於三十五歲，是〈日錄〉第三條；後條記於七十八歲以後，是倒數第二條。可知他一生不懈地以聖賢自勉。康齋每有年華飛逝，進學不及之歎，〈日錄〉：「當念歲月晚而學無成，可懼也。然既往亦不得而追矣。繼今隨精力所到而進，毋怠其志而已。視古人自少至老，始終一致者，不勝其慨愧矣。」(頁7上下，25條，35歲)「歲月如流，而學德有退無進。有志之士，其興感乎？無感乎？」(頁41上，318條，78歲)再看二十三歲詩：「十年踪跡寓神州，故國歸來更百憂。……誰憐白日難停馭，自覺秋霜易到頭。」(〈春夜〉，卷1，頁2下)七十九歲詩：「老去逾憐學聖難，日新程課敢容慳。」(〈不寐〉，卷7，頁45上)可見這種汲汲進學的急迫感，而是通貫其一生早晚的。

(二)康齋的教學

假如要用一句話概括康齋一生的話，可以說，康齋是聖賢之道的學習者和教育者。他一方面終身保持謙遜而兢業的學習態度，一方面也自覺地從事聖賢之道的教育工作。茲引他兩大弟子陳白沙與婁一齋對其教學的描述：

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而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祭先師康齋墓文〉，《白沙子全集》，卷5，頁12上)

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卻其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

顧。……間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於善。（婁一齋
〈行狀〉）

白沙所謂「純公之言」指明道獵心之說，是康齋志學之始，下文將言及，其次便是伊川師道之尊，可見學與教如其事業的兩輪，缺一不可。婁一齋則說康齋不收學費，甚至供應學生的生活，以康齋的清貧而言，是很難得的，可見他視教育為「道」，而非謀生之具^⑦。

康齋從事教學相當的早，本文附錄的康齋略譜引及他二十四歲、二十六歲時的教學活動，而且終身從事講學。至於教學內容和精神，可見康齋四十歲〈學規〉一文：

一、須用循序熟讀《小學》、《四書》本文，令一一成誦，然後讀《五經》本文，亦須爛熟成誦，庶幾逐漸有入。此個工夫須要打捱歲月方可。苟欲早栽樹晚遮陰，則非吾所知也。

一、學者所以學為聖賢也。在齋務要講明義理，修身慎行為事。如欲涉獵以資口耳，工詩對以事浮華，則非吾所知也。

一、古人讀書皆須專心致志，不出門戶，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輟，一暴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卷8，頁43上下）

可見康齋從事教育，以基本儒學經典為教材，以聖賢為目標。

他對教育是終身從事的，〈日錄〉及詩作中提到他的授書^⑧、講《論語》^⑨、

⑦ 白沙與一齋皆在康齋六十四歲時來學，康齋早年在任教是否也不收學費，無可考。但從一些「館穀」話語考察，當時出遊可以接受招待，則在外任教當無食宿問題。如「三年館穀春風裏」（〈奉寄族里〉，卷3，頁10上，53歲）。

⑧ 〈日錄〉，頁19下，104條，38歲；頁26下，164條，43歲。詩作如〈夜讀〉：「喜得諸生清苦共，小窗之外尚吾伊。」（卷2，頁12上，40歲）

⑨ 〈日錄〉，頁13上，62條，37歲；頁18下，101條，38歲（授小女《論語》）。

《孟子》^⑩、《易》^⑪。詩也是重要的教學項目，如講朱子〈感興詩〉^⑫。再學康齋二首詩：

殘經講罷慨虞唐，步月歸來興未央。詩卷寫闌吟更好，又揮餘墨兩三行。（〈書鄭侂卷子畢偶成〉，卷6，頁11上，70歲）

塵窗寒夜正遲遲，寂對殘燈獨詠詩。小子學詩方避席，諸生讀易俟摠衣。飫聞玄聖從吾好，須信文王是我師。流俗汨人非一日，昂藏莫負好男兒。（〈寒夜偶成示諸生〉，卷6，頁48下，73歲）

一首是講學回家後作詩，一首是這一頭教詩那一頭讀易。詩就算只是抒懷寫志，其重要性也大大提高了，這一點在論述其學時將再討論。

〈日錄〉是康齋進學與反省的記錄，他也教學生用相同的方法學習，他曾派弟子出外，便要求：

早晚所讀書，及視聽言動得失，應事接物當否，途中人家宿泊，凡交遊姓名，皆須逐日札記，歸日要看。（〈遣晏海黎普使金谿〉，卷8，頁44上，約50歲）

康齋五十一歲時曾赴南昌訪前國子祭酒胡儼頤庵（1361-1443）半月，還家時有〈贈同行諸生〉：

半月追隨謁國賓，今朝分手重慙慙。還家各記丁寧教，私錄工夫日日

⑩ 〈日錄〉，頁20下，117條，40歲。

⑪ 詩作有〈黃李四生習易小陂寒窗，旬月間六經風雪，賦此以勞之〉（卷4，頁18上，63歲）。

⑫ 〈日錄〉，頁23，139條，40歲。又，詩作有〈誦晦菴詩次韻〉：「病軀無餘事，先人富遺經。自陪二三子，明窗共經營。」（卷2，12上，40歲）康齋在父卒後繼承了圖書：「今年春，齋先君遺籍於蓮塘故址。」（〈跋伊洛淵源錄〉，卷12，頁1上下）當是豐富了自己的收藏。「今年春」或指康齋四十歲，而遺籍中包括了朱子文集。康齋三十六歲時未見朱子全集，四十歲時有讀《晦菴文集》的記載（〈日錄〉，頁10上，45條；頁20下，117條；頁22上，127條）詩作所記與學生共讀朱子詩，與〈日錄〉所記或為一事。

新。(卷2,頁46下)

可見他要求學生作〈日錄〉,而且要檢查。

康齋家貧親農,率弟子躬耕隴畝。下引一段是有關陳白沙的著名故事:

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公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公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一·吳康齋傳》)

在康齋詩文中,也有一些諸生服勞的記載,如〈壁沼以禦獺,諸生咸用力焉,詩以紀其成〉(卷3,頁21上,58歲)。〈勞諸生禦水患(時溪水泛濫將及屋,諸生築堤禦之)〉:「諸生用心力救水甚善,此之謂盡己也。事雖莫濟,分則盡矣。」(卷8,頁43下)康齋出遊時,農事也託給弟子照顧,如云:「離家從兩月,挈榼任諸生」(〈臨清端午王錦衣饋粽〉,卷5,頁17上,68歲),「湖海扁舟遠,園林數子勞」(〈寄李晏諸生〉,卷6,頁24下,71歲)。

更重要的是,康齋每利用農牧與出遊的餘暇講學,下文再作稱引。這樣以教師爲中心,一起工作,一起講學,令人想起宗教性的生活教團,如佛陀師弟、中國禪林等。但即使如此,康齋的教學仍然是儒家傳統的私人講學,學生自由來去,自由結合。因爲:一、康齋師生共同工作,是在物質條件匱乏下產生的教育形態,並未將工作視爲教學必須項目。二、學生來學時間可能不是很久^⑬。三、學生常同時是郡縣學諸生^⑭,因此不必完全融入康齋耕讀生活中。四、康齋頗謙遜,只是「倡道小陂」,未特別標榜宗派與集團意識。

最後可附帶談羅一峰(1431-1478)與康齋的關係。《明儒學案》載:

- ⑬ 陳白沙來學半年,婁一齋不久即歸。〈贈婁諒歸上饒序〉:「上饒郡庠生周文、婁諒,承其府主命來學,諒得寒疾先歸。」(卷3,頁20下-21上)
- ⑭ 如前註,周文、婁諒承上饒府主命來學。康齋在種湖時(五十至五十二歲),「郡庠生來遊寓館者十數士。」(〈五峰余氏族譜序〉,卷9,頁8下)

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峰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峰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崇仁學案二·婁一齋傳〉）

康齋有〈偶述〉詩：「病來文籍久相拋，閒看松篁雪後稍。懶性避人非敢傲，平生厭結口頭交。」（卷4，頁18下-19上，64歲）據此，他是迴避一般應酬的，因此立那樣的學規而得罪一峰，是很可能的。這是儒林的不幸，但藉此可證明白沙所稱「師道尊嚴」的一面。

(三)康齋的農牧

康齋親農，一些詩作反映了農業活動。〈灌禾〉：「田頭一一荷鋤過，自放寒流灌晚禾。隨分不辭筋力苦，坐看明月好懷多。」（卷2，頁16上，40歲）〈贈友人〉：「一犁春雨兒耕稼，百甕寒泉自灌畦。隨分無非安穩地，相逢何必問丹梯。」（卷2，頁24上，44歲）除耕田外，又有放牧詩，如〈夜牧〉：「涼氣蕭蕭露滿衣，碧天如洗月如規。浩歌一曲孤村寂，綠樹陰中牧犢歸。」（卷2，頁15下，40歲）。

康齋在農事間常讀書或思考，〈日錄〉提到的有觀農時思繹事理（頁8下，33條）「親農途中讀《孟子》」（頁9下，43條），「夜徐行田間，默誦《中庸》」（頁10下，49條，皆36歲）等。放牧時可能較空閒，教學或讀書的機會更多，如下引詩作。「群芳深處綠陰涼，童冠相呼受講忙。又與山靈添故事，曾從此地說匡章。」（〈江家坑偶成〉，卷3，頁17下，57歲）這是利用放牧的時候講《孟子》。「斜穿香稻度秋山，細講殘經午始還。」（〈大同原牧歸後坊，道中口占授小兒及曾正〉，卷3，頁24下，59歲）「悠哉四聖心，靜向林間窺。單騎日日來，飄飄澹忘歸。偶攜二三子，麗澤同箴規。（原注：與諸生說兌卦）」（〈牧大同原楊林坑即事〉，卷4，頁2上下，62歲）這是放

牧時講《易》。除了講經，又歌詩或教詩，如〈牧後坊〉：「遮莫風霜暮景侵，又因晴牧事幽尋。鄰童供命諸生侍，一曲真詮《擊壤吟》。」（卷4，頁39下，67歲）及詩題〈與諸生授康節詩道傍石〉（頁40上）。

康齋家境及健康附述於此。〈日錄〉中每歎貧病，如言十餘年中疾病相困，少能如昔精進，兼貧乏無藥調護（頁7上，23條，35歲）；言寒疾時作，讀書工夫間斷，昏昏竟日（頁15下，74條，37歲）；言借穀及舊債難還（頁14上下，69條；頁15上，72條；皆37歲）。〈行狀〉形容為「公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詩作有〈寒夜枕上作〉：「屋弊風如箭，衾單人似冰。但憐妻子病，敢計此身寧。夙志空懷古，迂謀拙理生。體羸何所作，漫喜此心平。」（卷2，頁28上，47歲）也很能寫出貧困的苦況。但康齋六十八歲奉詔上京，得到賞賜，六十九歲詩作有〈賜金墾田〉（卷6，頁1下），應該略有小補。同時，他晚年有「幸得微軀能勿藥」（〈晚坐自得亭〉，卷6，頁13上）、「病軀粗健何妨老」（〈舟近豫章〉，卷6，頁27下）、「羈懷竊幸一身強」（〈別武昌〉，卷6，頁19上，皆71歲）之言，似乎晚年身體轉健。

（四）康齋的閒逸與出遊

康齋喜吟詠，集中詩作七卷，粗算得一千四百多首。吟詠離不開閒情逸致與遊覽，這兩件在康齋不僅不缺少，且絕對稱得上豐富。

前文已引述康齋終身奮勉不懈的情形，這和閒情逸致如何調和呢？首先，他對讀書環境頗能欣賞。從〈日錄〉已可看到不少，如「南軒讀《孟子》甚樂」（頁3下，12條，35歲）。此處再引兩首詩作。〈觀梅〉：「梅花滿眼感懷新，正月俄驚十日春。花落更開開更落，小窗忙殺讀書人。」（卷1，頁30下，32歲）〈夜讀後對月〉：「青燈讀倦閣遺編，見月多情又不眠。欲識此心虛妙處，沉沉戶牖嫩涼天。」（卷1，頁37下，35歲）。讀書固然要用功，但也該抬頭欣賞一下自然，梅花開開落落夠人忙看了，而寂靜的月夜也正可印證

此心的虛妙。

康齋有股用功不懈的精神，枕上反省的習慣有休息時不忘工作的意味。還有一些詩，如〈曉枕作〉：「黃卷新功日又加，愈知聖道浩無涯。長更寧忍貪高枕，爭奈昏昏兩眼花。」（卷7，頁29上，76歲）流露著一種光陰可惜，勉強要起床（或不肯上床）的志氣。但縱觀其詩作，他並不是有張無弛的人，其詩有以閒為題的，如〈閒述〉（卷1，頁13上，30歲）、〈閒趣〉（卷2，頁2下，36歲）、〈閒興〉（頁8上，39歲）、〈門外閒坐〉（頁12下，40歲）、〈閒中偶述〉（卷4，頁3上下，63歲）。而詩中有閒趣及提到閒字的就更多了。如〈獨步偶成〉：「暫出孤村縱野踪，晚涼歸詠更從容。盈眸好景新晴後，人在乾坤清氣中。」（頁13上）〈臨流瞑目坐〉：「物外元無我，閒中別有天。臨流時抱膝，此意向誰言？」（頁14下，41歲）〈夏日偶成〉：「臥病止衡門，何以娛長日？卷舒架上書，遊戲閒窗筆。」（卷3，頁30下，60歲）等等。

康齋出遊的情形也可從詩作中考出。他在家期間，有到附近山水遊覽的，有因省墓而遊覽的。出遠門的經歷，二十一歲到三十一歲間，曾赴金陵省親，赴武昌等。六十三歲遊金陵，以後出遊較為頻繁。〈遊金陵稿〉第一首〈宿熊璣氏〉云「江湖遠適為求醫」（卷4，頁4上），大概是此番出遊的目的。但第二首〈發孔家渡〉說「未了平生山水債」，就有想玩個痛快的意思了。〈適閩稿〉第二首〈孫坊道中〉也說：「未了平生山水債，寸心遙向七閩飛。」（卷6，頁30下，72歲）

值得注意的是康齋在旅途中仍然讀書講學不輟。〈景德舟中〉：「幾展寒衾未忍眠，殘燈旋剔又舒編。雖云甚矣吾衰也，一息猶存合勉旃。」（卷7，頁12下-13上）又是捨不得就寢的夜晚，這是七十五歲遊饒州途中之作。再舉兩首詩，是七十六歲短程出遊時作。〈宿西廡彭氏之一〉：「詩成頻聽曙鷄聲，卻喜靈臺一點明。須識宴安真鴆毒，足知憂患乃吾生。」〈之二〉：「平

生雅志在希顏，歲晚工夫始識難。但保寸心長似鐵，何妨萬水與千山。」（卷7，頁30上下）第一首是夢醒或早起時作詩並自勵。第二首的萬水千山，象徵了人生的種種遭遇，同時也是實寫旅程，而見其倔強不屈的志氣。

至於康齋在旅途中講學，這裏也略舉幾個例子。〈守風青草洲〉：「箇中欲問行藏意，未達中庸是我憂。原注：日與程喜說《中庸》。」（卷4，頁5上，63歲）這是旅途中講《中庸》。《宿楓山車氏莊》：「熏衣茶宴罷，爲爾細談詩。」（卷4，頁22上，66歲）這是和主人談詩。〈即事〉：「借得禪房久寓居，閒中轉覺日舒舒。二三童冠相於好，臥聽琅琅小學書。」（卷4，頁36上，67歲）參前後各詩，是時康齋赴羅原岡省祖墓，借住僧寺二十餘日，當地的學童及成人來向他學小學。〈長山晏氏〉：「他日長山疑夢處，諸生濟濟夜眠遲。」（卷7，頁10下，75歲）這也是他旅行時隨處講學的例子。

三、康齋的學術

（一）聖賢之學

1. 志學專篤

前言中已引用黃梨洲和當今學者對康齋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看法。現在再引用康齋弟子對師學的定位，以進入主題。

紫陽沒世，道統無傳，所尚者文詞訓詁，功名利欲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覽前跡而啓其任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絕學，誠曠古之豪傑也。

（婁一齋〈行狀〉）

元氣之在天地，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網緼。先生之生，孕三光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之淳乎！（陳白沙〈祭先師康齋墓文〉，《白沙子全集》卷5，頁12上）

康齋學術可從各種角度來掌握，但筆者以為就其全貌來看，是很單純的聖賢之學，康齋便以這種學問復興宋學、開啓明學。一齋的評論就其復興宋學而言，白沙則視之為明代精神的代表，其實這兩點是相通的。程朱之學雖然從元代開始取得正統位置，通過科舉而成爲士子的普遍知識，應屬興盛，但一齋卻謂之絕學。因爲在程朱之學由流衍到取得正統時，所發展的是對程朱經註的敷衍，如收於《通志堂經解》的多種纂疏，至成祖時編成《四書五經大全》，成爲科舉的依據。在這過程中，程朱之學的根本精神——對聖賢人格的嚮往追求卻失落了。一齋所謂「道統無傳」即指此而言。宋代理學家治學的出發點是學聖賢，然後才在經書研習中發展其理論及經說。理論與經說的目的不外是說明、證成聖賢之學，但發展的過程常是弔詭的：理論愈說愈遠，經說愈析愈細，再摻雜以功名利祿的動機，反而成爲聖賢之學的障礙。這時理學傳統（道統之傳）的承續或中興，有賴於一再地回歸到這根本精神，並據以發展新的理論及經說，例如朱子、象山、陽明少時皆有志聖賢，而後才成爲理學與經學的大師。康齋學術的意義就是在理學已淪爲文詞、訓詁、科舉之時，獨尋本源，努力地學聖賢。不僅其高第弟子這樣評價他，他自己年輕時亦如此自許，詳下節。康齋本人或因才性、環境的關係，在理論與經說方面的有所不足，因而雖是宋學的復興者，而不能有思想或經學上的開拓；雖是明學的開創者，但只留給後人光輝的人格，所謂元氣之淳。然而他對聖賢之學的恢復，卻爲明代理學與經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康齋十九歲始志於聖賢之學。婁一齋說：

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學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

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行狀〉）

關於《伊洛淵源錄》的啓發，茲引康齋之言以參證。「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觀周、程、張、邵諸君子出處大概，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慕之。於是盡焚應舉文字，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爲心而自學焉。」（〈與章士言訓導書〉，卷8，頁17下）「永樂己丑冬，姑蘇別駕李侯能白寄此集于先君，與弼燈下閱之，伏睹道統一脈之傳，不覺心醉，而於明道先生獵心之說尤爲悚動。蓋平昔謂聖賢任道之統者，皆天實篤生，非人力可勉，遂置聖賢於度外而甘於自棄。及睹此事，乃知所謂程夫子者，亦嘗有過，亦資於學也。於是思自奮勵，竊慕向焉。既而盡焚舊時舉子文字，誓必至乎聖賢而後已。」（〈跋伊洛淵源錄〉，卷12，頁1上、下）從這兩段可見出康齋所謂道統即聖賢之學，而宋代理學家所表現的出處行事與光明心地使他嚮慕願學。明道的見獵心喜使他領悟到聖賢也是由內省改過而做成，然後他以兩年的時間苦讀《四書》諸經、洛閩語錄^⑮，直到致病還鄉。途中舟遇風而不動心，顯然是模倣伊川的^⑯。

康齋對聖賢之學的專篤，現象之一是〈行狀〉所謂「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這股精神早年便得其友指出。〈日錄〉有云：「觀壁間帖，故友孔譔繡衣巡按江西時，與先子書有云：『前與與弼契兄接談時頃，探其中蓋有威武貧富之所不能屈移者。今雖蹇滯，異日當爲令器，不必慮也。』」

^⑮ 康齋二十歲從學於楊溥，二十七歲有詩〈夢洗馬先生〉，其中有云：「剪燭論心夜，焚香讀《易》晨。己私須盡克，天理必全純」（卷1，頁4上），則當時討論及心性說及《易》學。

^⑯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二程全書·外書》，卷12，頁3下，19節）

惕然重書以警惰。」（頁38，292條，78歲）^{①⑦}篤志聖學的另一現象則夢見聖賢，〈行狀〉謂「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日錄〉中有許多夢孔子及朱子的記載，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譏^{①⑧}。

2. 學問的進步

前曾述及〈日錄〉和詩作的內容早晚無大差別，這是志於聖賢的現象，因為標準的絕對和學問的單純，使得幾十年看起來都沒甚麼進步。但由其弟子觀之，則以為「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又不是真的沒有進步。康齋自述中，雖然早年晚年無大差別，但仍然有具體提出進步之處。以下略加引述，以期對其學問的性質有進一步的了解。首先是他在三十一歲時，有數封書信提到讀《四書》有得：

男自今年正月來，多看《四書》，頃刻不離，頗覺身心粗有所得，於聖賢分上用工，亦似有下手處，方知天之所以窮苦於身，吾親所以責備於行者，恩何至哉！（〈與嚴親書〉，卷9，頁14上、下）

聖人之道，……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惟其未誠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戰，順理乎？繫累於欲；從欲乎？有所不屑。撓乎其中，慙乎其心。……僕坐此患十餘年矣，抱慙朝夕，亦云至矣。今年從春來，一以《大學》、《語》、《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粗有所見，乃喟然歎曰：「聖人之道果易曉也，果易行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朝夕之慙，而有以超然樂乎群物之表矣。」因益加力焉，所見益似親切。於

①⑦ 康齋三十九歲、五十一歲時皆有詩懷念此事以自勉。見卷2，頁7下，47上。

①⑧ 「其講學之功備見於日錄。第一條即稱乙巳（1425）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1456）二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1461）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此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或亦有之。至稱新居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二從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不覺歟？」（〈康齋集〉，卷首）

是又歎曰：「世俗固吾棄，吾庶幾以自與；世俗固吾笑，吾庶幾以自得。吾方聖賢之親，而違恤其他乎哉！」（〈與徐希仁訓導書〉，卷9，頁15上、下）

今年自春初，專玩《大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舊疾稍減而精神稍益，沈潛晝夜，反覆身心，然後知聖賢之道豈獨古而不達時宜？豈真迂而闕於事情？豈誠僻而且怪？向之軼軻齟齬於十年之間者，於聖賢之道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與章士言訓導書〉，卷9，頁18上、下）

所謂康齋學問早年晚年無大差別，一方面是其自省之言早晚頗一致；另一方面他十九歲立志聖賢後，有兩年時間奮力研習《四書》、《五經》、諸儒語錄，而他一生學問，從知識的角度來說基本上未超這個範圍^{①9}。因此這時的進步是就行為、存心、體驗而言。康齋二十一歲回鄉時，力行古道，與俗相忤，帶有一種狂氣，同時又多疾病，生活亦不安定^{②0}。但在三十一歲專力《四書》時，他說其身心粗有得，說聖賢之道易明易行，雖然只是說在知解上比以前更深入地體會，而更相信聖賢之道，但又何嘗不是他經過多年努力，和聖賢逐漸接近的結果。唯其如此，他能夠免於理欲交戰的憤懣，而他對於與世俗落落難合之

^{①9} 可參考〈與嚴親書〉：「男少有所得，渾在《小學》、《四書》、《語略》、《近思錄》、《言行錄》（原注：時先生尚未見《程氏遺書》、《朱子語類》），於此數書苟無所深得，則他書易壞心術，其害非淺鮮也。」（卷8，頁26下，35歲）「《小學》既熟，方好用工。《四書》、《五經》須令成誦，使其言如自己出，則味自別。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非虛言也。」（〈與曰讓書〉，卷8，頁31上，書中提及奔喪，當在三十六七歲時）晚年〈日錄〉多記載讀《易》。

^{②0} 〈與章士言訓導書〉：「學之累歲而行與時違，或以為古而不達時宜，或以為迂而闕於事情，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可見其行有狂處。〈上嚴親書〉：「年二十一回鄉，粗涉人事，然後漸知力行之果不為易，又天之所以拂亂其所為者恆極其至，兼以疾病纏綿，茫然不知道路所由，安得而順乎親哉？」（卷8，頁13下）可見其健康不佳，生活不安。

處，也在自信自得的情況下，轉為平心靜氣。

另外〈日錄〉三十五歲時有克服剛忿一長段，也是學問進步一例，節引於下：

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干。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洒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頁4上-5下，13條）

康齋晚年〈日錄〉不見對發脾氣的反省。相關資料有一條：「張思叔詬罵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朱子云：『不哭底孩兒誰不會抱。』又云：『處順不如常處逆，動心忍性始成功。』」（頁39下，302條，78歲後）此條未說到自己發脾氣，可能只是錄以自勉。如果這樣，則此時康齋的脾氣和明道的獵心一樣，雖然不能無過，畢竟已屬細微。乍看起來，克制脾氣是爲了處世和諧而壓抑性情，一再的痛悔克制則有些迂腐，然而克制脾氣是〈日錄〉的兩個重要工夫之一（另一是安於貧賤），不可等閒視之。其實這兩個工夫正反映出心性論的發展，此處試略加分析。

爲何要克制脾氣呢？最直接的理由，自然是儒家對中和的重視。康齋有詩〈正月十九夜枕上作二首〉：「自歎生來後聖賢，下流入道苦難前。何由養得中和性，樂以忘憂理渾然。」「樂以忘憂理渾然，後生豈易造斯言？欽然下學

無他法，一味深功克性偏。」（卷1，頁35下，35歲）〈中和齋〉：「堂堂大本固無偏，達道離離自粹然。氣質萬殊非我性，克治何惜日乾乾。」（卷7，頁3上，74歲）克制脾氣是消極地說，其積極一面便是儒家中和的道德理想。更具體言之，康齋有學程明道的意思。〈行狀〉對克制脾氣的敘述是：「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一齋以為抑制脾氣最初的動機是「慕明道之和易」，回看〈日錄〉長段，康齋二十歲從學楊溥，始覺剛忿之過。是時他正是得讀《伊洛淵源錄》，嚮慕理學大儒人格，特別是明道的改過不吝，因此一齋的說法是有根據的。他克制剛忿的方法也出於明道〈定性書〉^②。茲引其中重要文句來比觀。橫渠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明道批評其病根在於「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病就是康齋所說：「吾近日之病，在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明道說：「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就是康齋所謂：「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干。」明道說：「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物之不足惡，於道亦思過半矣。」即是康齋說：「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大概康齋本熟悉明道的文獻，在克制剛忿時，很自然地消化明道之說，體會到人心本來無忿，不必勉強求和平，而要在與物相忤、不順於心時，詳審其理以應之。但再玩味康齋之言，雖然在動機、方法上承自明道，卻比明道更重視主體的存在。明道定性的基礎是天人一本論，《定性書》開始幾句是「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

^② 《二程全書·明道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年《四部備要》本），卷3，頁1上下。

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又烏可遽語定哉？」要人跳出自我，從天的視野平觀是非、物理，而沒有內外物我的相對。這幾句康齋其實不太接得上，康齋更偏於保持心的虛明以應物，強調的是心本無剛忿，遇物之不齊，當詳審其理以應之。這不是超越自我，而是建立真正的自我。從這觀點看，康齋雖嚮慕明道的和易渾厚，但在思想基礎上卻離開主張天人一本的明道，而向建立人的德性主體的伊川靠近²²。於是其修養工夫也就採取了伊川朱子的主敬窮理說，康齋在上引〈日錄〉之後，便接著說：「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同年又有言「一事少含容。蓋一事差則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忘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遠矣。」（頁7下，26條）從這兩條可見出他對主敬窮理的重視。

以上對康齋克制脾氣的實踐略作分析，以見其中牽涉到明道、伊川的人性論。康齋本身對理論並無興趣，只是困勉實踐而已，但在不斷歎難之際，德性主體卻日進於堅強充實，從下引可以看出：「涵養此心不爲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頁29上，186條，46歲）「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頁30下，200條，46歲）不爲事物所勝，是德性主體的勝利。

康齋〈日錄〉另一修養的重要主題是安於貧賤。上文建立德性主體的解釋也適用於這一類條目。茲舉一例：

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

²² 參看拙作：〈二程心性說析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期，頁437-450，關於伊川心說的討論。該文雖未指明伊川企圖建立德性主體，但可以引伸出此意。德性主體與知性主體相對，指建立道德的自我而言。

熟故也。……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為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頁6上下，19條，35歲）

這裏的逆主要便指貧困而言，厭貧困故生怨尤。貧困不一定能克服，但不怨不尤則是真正的道德工夫。康齋於此一如其於剛忿，做出內外之辨，指出聖賢之心如止水，順逆境皆處之以理。聽天命、不怨尤不是無可奈何，而是內心充實，不可動搖的表現。康齋對此有真誠的努力，如〈日錄〉有云：「有困極詩云：『困固平生甘，不意如此極。前程一聽天，多憂諒何益。』」又云：「本心所主渾由己，外物之來一聽天。」（頁25上下，153條，43歲）能聽天命，正因另一方面有自我作主的工夫，此外又屢言不怨不尤，屢言德²³。

康齋一生都談克制脾氣與安於貧賤，似乎無大進步，弟子看來則進步甚大。關於脾氣，前已引了「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至於貧賤，又有如下記載：「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熟仁而勝大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鳶飛魚躍之妙矣。」

²³ 言不怨不尤，如〈日錄〉頁10下，50條；頁16下，82條；頁22下，131條；頁23下，138條；頁24上，142條；頁26上，159條；頁27上，171條；頁35上，252條；頁36下，269條等。言德，如「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卻為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脩而可厚吾德哉！」（頁10下，48條，36歲）將德看成精神財富，力求充滿與積累。又可見於頁12下，59條、61條；頁15上，73條；頁21上，120條；頁21下，125條；頁25上，152條；頁30下，198條；頁40上，306條等。又常痛感學德無進，如頁12上，58條；頁13下，64條；頁18下，101條；頁19下，107條；頁20上，110條；頁29下，191條等。古清美先生指出康齋在兢兢實踐中顯出一股自信力，故最能代表其學的，不是人所常引的「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頁5下，16條，35歲），而是「精白一心，對越神明」（頁18下，100條，38歲），其言至為有見。參考《明代理學論文集》，頁22。

(〈行狀〉)

康齋晚年，特別是應詔入京後，其名氣也大了，這時除了不怨尤之外，不驕矜的修養可能更為重要。康齋此時每有聲聞過情之歎。如說：「到處虛名動士林，平生孤負秉彝心」（〈次前韻寄示兒〉，卷6，頁17下，71歲）、「問學無功行莫脩，過情聲聞負朋游。回頭難返西飛景，逐日徒增老去憂」（〈感興〉卷7，頁7上下，75歲）、「曾向韶華惜寸陰，直期心契古人心。竟無定力勝塵鞅，空有虛名玷士林」（〈奉寄李舉士〉，卷7，頁17下，75歲）、「一生總被虛名誤」（〈責躬〉，卷7，頁30下，76歲）等。不驕矜，也是內心充實的表現。

康齋晚年仍然汲汲進學，但對外物似更多順命之言，似比中年要瀟灑一些。如云：「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頁34下，243條，69歲）「凡事不可用心太過。人生自有定分，行己則不可不慎。」（頁34下，247條，70歲）「閱近數年〈日錄〉，萬事不必計較，徒勞心耳。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公，仁也；順應，義也。」（頁37上，275條，75歲）「天道福善禍淫。君子但當謹守先聖賢名教，居易以俟命而已。」（頁38上，286條，77歲）晚年則喜胡安國「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之言^②。行雲流水句，康齋常用來寫旅行，如：「行雲流水曾聞命」（〈曉枕作〉，卷4，頁37上，67歲），「流水行雲任我真」（〈辭家口占授小兒及諸生〉，卷6，頁30下，72歲），「素達行雲流水趣，琴書又作小春行」（〈東游口占授小兒及諸生之一〉，卷7，頁10上，75歲）。但人生又何嘗不是旅途呢？〈對月〉：「照日東升月，隨緣北住人。寸心元似水，兩鬢任如銀。得失幾無定，榮枯事有因。素諳名教指，敢不日書紳。」

^② 〈日錄〉頁34上，239條，67歲；及〈宿呂家壩先隴右畔李宅〉：「行雲流水良隨遇」句原注（卷4，頁35上，67歲）。

（卷7，頁21上，76歲）人生旅途中，得失要隨緣，道德要堅持，這就是康齋的態度。

3. 悅樂

康齋〈日錄〉中，和刻苦奮勵相對，有不少對心境從容和樂的記述，最有名的是「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頁5下，16條，35歲）。從周濂溪起，孔顏之樂或曾點之樂就成為理學家學問的主題之一。康齋對於心境之樂的描述，也常用這類熟語，如云：「二月二十八日，晴色甚佳。寓寫詩外南軒，嵐光日色，曠映花木，而和禽上下，情甚暢也。值此暮春，想昔舞雩千載之樂，此心同符。」（頁8上，29條，36歲）

學者視康齋的悅樂為刻苦奮勵後道德充實的結果，有相當道理，但尚可進一步分析。〈日錄〉始於康齋三十五歲時，上引兩條便出於〈日錄〉開始的部分。讀康齋詩，還可找到更早的材料。二十九歲時有〈曉出〉：「際曉出柴扉，清涼過雨時。落花香滿徑，芳樹綠成帷。鳥啣有餘暇，水流無盡期。值予道心長，歸詠正相宜。」（卷1，頁8下）三十歲時有〈閒述〉：「靜裏生詩思，閒中長道心。自應尊檳玉，不省說贏金。芳樹流春色，空庭落午陰。日和風更澹，此樂有誰尋。」（頁13上）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道心」之樂，不能說比晚年境界差多少。這類詩作在《康齋集》中常見，似乎悅樂和惕懼同樣是康齋心境的常態，不待特殊條件而後有。筆者所謂康齋一生似無進步，即指此而言。

當人沒有名利的束縛，心閒無事，又欣賞到好風景時，大概就會有曾點之樂。學者會想對康齋的樂境做解釋，可能因為這和他「五更枕上汗流淚下」的印象不太協調。但假如全面地看康齋著作，特別是其詩作的話，可以發覺康齋固然比常人用功得多，在學德上堅持進步不懈，但他並非如想像中的困縛苦楚，前文便曾介紹其生活中的閒適與屢次遠遊。這裏要討論的是康齋從事聖賢

之學時的樂境，而這種樂境是有進步的。

聖賢之學的樂境，最直接的是讀書之樂。例如：「食後坐東窗，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日錄〉，頁2上，5條，35歲）靜心讀聖賢書，有體會有進步，自然會樂。這是一分工夫一分樂，尚不待積累。在康齋，最高的樂不是悟道或發明新學說，而是不改其樂，即曾點之樂能不因逆境而間斷，這裏才見到真正的工夫與進步。如云「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頁34上，235條，67歲）「夜臥閣思朱子云：『閒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乃真樂也。勉旃勉旃！」（頁39上下，301條，78歲）前文所引胡九韶對康齋處貧賤患難的觀察：「及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鳶飛魚躍之妙矣。」（〈行狀〉）所稱道的也是這種不間斷的樂。

4.理論綜述

筆者前文謂康齋對理論並無興趣，這是從其治學總體傾向來說的，但我們仍可就其文字，分析大致的理論。前文曾據〈日錄〉指出康齋在日用常行做工夫，而表現出德性主體的確立。此處引用一些其他文字做更詳細的說明。

世之志於學者，孳孳早暮，不可謂不勤也。其所求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效而已。志雖益勤，學雖益博，竟何補於身心哉！是則非聖賢志學之旨矣。聖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故君子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為天理而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去。涵泳乎聖賢之言，體察乎聖賢之行，優柔厭飫，日就月將，毋期其近效，毋欲其速成。由是以希賢而希聖，抑豈殊途也。（〈厲志齋記〉，卷10，頁1上、下）

此文作於康齋三十一歲時^{②⑤}。從康齋對「世之志於學者」的批評，知道他棄科舉從事聖賢之學，是一種捨魚取熊掌的自覺選擇。從事聖賢之學必有方法，就是遵從聖賢所教的大學程序。康齋把八條目更精約為明心，修身、達於天下，而明心與修身又是渾成一片，歸於存天理去人欲，故說「君子之心必兢兢於日用常行之間，何者為天理而當存，何者為人欲而當去」^{②⑥}。心與行渾成一片，反映康齋同時重視德性主體與日用常行，兩者是渾成的，皆以學習、體現聖賢為目的。

前文曾論康齋的工夫要旨是主敬窮理，康齋三十二歲時已經提到：

大抵聖賢授受緊要惟在一敬字，人能衣冠整肅，言動端嚴，以禮自持，則此心自然收斂。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但讀書明理以涵養之，則尤佳耳。（〈與友人書〉，卷8，頁25上）

敬是收斂心，但也貫通於行為上的整齊嚴肅。窮理主要指讀聖賢書，其範圍比朱子狹窄。可見孔孟與宋儒已成為他的聖賢典範，他的工夫在學習與體驗，而不在重新解釋發揮其義理^{②⑦}。

康齋六十八歲奉詔入京時，對心與日用的結合，有更深入的看法：

②⑤ 本文有「予年弱冠，賦厲志詩，……攸然十更寒暑」之言，文末謂訪傅秉彝所作。考〈墨池記〉：「傅君秉彝，臨川驛溪人也。永樂中，予訪君驛溪。」（卷10，頁16下）辛丑三十一歲時有詩〈題一丘軒〉，序云：「予以客遊，因訪故人傅秉彝於驛溪。」故知此文作於三十一歲時。

②⑥ 又如〈日錄〉：「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頁2上，6條，35歲）

②⑦ 再引兩段〈日錄〉相證。「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頁16上，78條，38歲）「枕上思《晦庵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暴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有意味也。」（頁22上，127條，40歲）

竊嘗以謂身垢易除，心垢難浣。夫心，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貫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萬事，本自瑩徹昭融，何垢之有？然氣稟拘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爲垢無窮，不假浣之之功，則神妙不測之體，幾何而不化於物哉？予幼承父師之訓，嘗讀先儒釋日新之旨，每恨洗滌工夫未聞焉。又讀夫子贊易洗心之章，聖人妙用未易窺測也。於是退而求諸日用之間，從事乎主一無適及整齊嚴肅之規，與夫利斧之喻，而日孜孜焉。廉隅辨而器宇寧，然後知敬義夾持實洗心之要法，等而上之，聖人能事可馴而入。（〈浣齋記〉²⁸，卷10，頁13上、下）

此文提到心是普遍與潔淨的，是人所以成爲聖賢的依據。雖然因爲氣拘物蔽，須經過洗心工夫始能恢復虛靈，但心已經被當作核心概念。於此可見康齋對德性主體建立的關切。康齋雖如梨洲所言，心性論和工夫論一本宋人舊說，但在關切成聖賢的情形下，心已成爲其學說的焦點，因此可以說他居於白沙、陽明的先驅地位。

梨洲謂白沙雖從學於康齋，實爲別派。一般亦認爲康齋承宋學，爲人篤實謹嚴，白沙開明學，風格超脫放曠，因而白沙所得於康齋者僅止於人格的感召。白沙〈祭先師康齋墓文〉有云：

先生之教不躐等，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白沙子全集》，卷5，頁12下）

「日新又新」以前，述康齋重修養的特色，應爲大家所共認；但「勿助勿忘」以下，則白沙似乎把自己的學說加到康齋身上了。但康齋的〈日錄〉與詩作實談及白沙所提的境界。勿助勿忘指工夫入於自然，無法著力的境界。〈日

²⁸ 浣齋是「南陽李先生退食之所」，按：指大學士李賢，鄧州人，即推薦康齋入朝者。此文當在六十八歲時作於京師。

錄〉：「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頁25上，151條，42歲）「勿忘勿助，近日稍知此味。天假以年，尚宜少進，窮通得喪可付度外也。」（頁26上，161條，43歲）「先儒云：『道理平鋪在』²⁹。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是如此？」（頁27上下，169條，44歲）。在詩作方面，則可舉「偶爾閒行繞碧溪，梅花開處詠多時。固知道理平鋪在，方寸何容半點私？」（〈溪上偶成〉，卷3，頁22上，58歲）「涵養工夫敬是宜，鑑空之體本如斯。須知道理平鋪在，順應何容一點私。」（〈題正心齋〉，卷6，頁18上，71歲）工夫是針對人的未見道理，受私欲束縛而設的，因此工夫的前提就是道理的存在，以及人心本無私欲，就是所謂本體。以康齋工夫的精勤，以及憤樂張弛的調配合宜，自然會有道理平鋪的體驗。勿忘勿助是合本體的工夫，白沙門下湛甘泉大加宏闡，而其源實出於康齋。

（二）書本之學

以上討論康齋聖賢之學，和《四書》與宋儒著作是分不開的，但康齋讀書的情形可以單獨提出來討論，以求進一步了解其學問的性質。

康齋讀書目的在熟習聖賢人格、行事、氣象，至於論說的異同，似乎引不起他的興趣。例如自程子以來，理學家便喜批評韓愈的儒學程度³⁰，康齋則說：「看韓文倦睡，夢中恍思少年日月，不勝感愴而醒。『聰明不及於前時

²⁹ 這是二程之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二程全書·遺書》，卷2，頁16上，137節）

³⁰ 韓愈是宋學前驅，對儒學的「用」與「文」有甚多的建樹，但在「體」的方面則不足。伊川朱子皆批評此點。拙作《二程聖人之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年），頁67-72羅列伊川、朱子的批評，可參考。

，道德日負於初心』，信哉！」（頁28上，175條，45歲）按，康齋所讀為韓愈〈五箴〉，作於貞元二十一年（805，韓愈38歲）。其序云：「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前一年，韓愈因奏請停徵京兆府稅錢及田租，被貶為連州陽山令，直至本年夏秋之際才蒙赦離^①。〈五箴〉有自警多言賈禍之處，也有倔強不屈，不肯認錯之意。但康齋受感發的則是序中「聰明」兩句，以其觸動他對少年生活的回憶，而和汲汲聖學的心境相印證。康齋詩〈讀韓子〉：「逝矣古人心獨在，遺編一一靜中看。」（卷4，頁1上，61歲）可以知道，康齋對和人品道德有關的文字體會甚深，且反求於自己身心，互相印證，而不把古書作為客觀歷史事實來理解，人品道德之言也未放入歷史脈絡裏求其實義。

又如朱陸鵝湖之辯是重要的議論題材，康齋詩〈默詠朱子及陸象山兄弟鵝湖倡和詩，僭次其韻〉：「先哲高風悉所欽，考亭朱子益留心。滄溟浩浩吞諸水，泰華巍巍失萬岑。理極研精無窅奧，形純踐履更深沉。微軀每恨生來晚，空慕聲容隔古今。」（卷1，頁35上，34歲）象山和詩三四句為「涓流淌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朱子和詩為：「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②對照之下，知康齋詩雖本於朱子之詩，但三四句實脫化象山詩而得。象山詩指出有本而後能久大，猶孟子說本心：「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諸四海，有本者如是。」（〈離

① 以上引文及考證，參考《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31，羅聯添師《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頁63、70。

② 象山、朱子詩分別見《陸象山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71年），卷34，〈語錄〉，頁276；卷36，〈年譜〉，頁322。

婁下·18章〉)《中庸》說誠：「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乎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26章)康齋脫化此二句，固然可能反象山之意以強調朱子博學工夫的偉大³³，但玩味全詩，這兩句更像是對朱子偉大人格的嚮往，而非擁護朱子積累知識的主張。假如筆者的理解不誤，則明明互相辯論的詩，到了康齋，卻融化成贊歎景仰，則其缺乏論辯精神可知。康齋對程朱的人格氣象，乃至其學說，多以詩歌來詠歎，其意義留待下小節再論。

又如讀史書，〈日錄〉：「觀史時見古人卓卓之行，不勝感激，益思自奮。」(頁17下，90條，38歲)走的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路。又如論宋太宗燭影事是私欲蔽心(頁1下，3條，35歲)，論王導學力不足，使晉元帝安於小成，不能進求王道(頁16下，83條，38歲)，都是對歷史人物作道德裁判。

至於康齋對《四書》的重點及《五經》眾說的採擇，茲錄一齋〈行狀〉，並將康齋語列於附註：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恆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³⁴；《孟子》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爲本³⁵；

³³ 錢穆先生便如此解釋：「康齋之贊朱子曰：『滄溟浩浩吞諸水，泰華巍巍失萬岑』，是極能欣賞朱子道問學博文之一途，而康齋亦絕不以此見長。」(〈明初朱子學流衍考〉，頁4)

³⁴ 〈曉枕作〉：「博約須令莫暫違」(卷7，頁18上，75歲)，〈省躬〉：「何以激昂偷惰氣，博文約禮是餘生。」(頁31下，76歲)

³⁵ 〈上嚴親書〉：「孟子所謂四端，逐日省察體驗，而凡所以持身，所以處家，所以接物，似各有所持循。」(卷8，頁26下，33歲)〈日錄〉：「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54條，36歲)〈午枕〉：「寸心似水無纖浪，認取鄒書夜氣功。」(卷1，頁37上，35歲)〈次打石港〉：「當年曾此泊晴灣，細讀鄒

《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³⁶。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³⁷，《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³⁸，《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³⁹，《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

書（不立巖牆之下章）向夜殘。始信萬緣端有命，欲爲君子卻誠難。」（卷4，頁4下，63歲）〈聽誦孟子三樂章〉：「一聽鄒書三樂辭，肅容斂衽起遐思。係天人處猶能得，自致云何不念茲。」（卷6，頁24上下，71歲）〈勸學贈楊德全〉：「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仁義禮智四端也。……欲異於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義禮知而已矣。」（卷8，頁42上）

- ③⑥ 〈讀中庸〉：「一理存乎靜，萬事著於微。是以君子心，戰兢恆自持。」（卷1，頁21下，31歲）〈偶述〉：「欲遵君子業，名教貴昭融。能事參天地，元基慎獨功。」（頁29下）
- ③⑦ 〈讀易〉：「悠哉四聖心，玩味頻起敬。」（卷1，頁25下，35歲）〈晨坐東齋〉：「一玩謙亨辭，冷然滌心垢。」（卷2，頁8上，39歲）〈晝寢覺作〉：「眇然方寸經綸本，萬感誰憐此地危。敬枕細思敦良旨，幾人曾向吉中歸。」（卷2，頁11上，39歲）〈即事〉：「素聞亨困旨，貴在熟吾生。」（卷7，頁22上，76歲）〈對雨書懷〉：「觀生時學《易》，習靜日同禪。」（同上）〈讀易絕句〉：「消息盈虛萬不齊，等閒誰識此心微。春窗燈火無言處，剛悔因仍學《易》遲。」（卷7，頁34上，77歲）〈沼上芙蓉花開〉：「玩易亭中歸去遲。」（卷7，頁37上，77歲）〈又偶成〉：「萬緣由命不須愁，晚節蹉跎是我憂。羲畫周文同坐臥，夕陽西去水東流。」（頁37下）〈偶成〉：「富貴無心生有涯，朝昏務去是矜誇。高眠玩易微吟處，又對芙蓉滿眼花。」（同上）〈候饒循〉：「暝倚虛庭玩偶奇。」（頁38上）〈立春感懷〉：「日日潛心向伏羲。」（頁40下，78歲）又按：陳白沙述及康齋熟悉伊川《周易傳》：「吟殘老杜詩千首，看破伊川易幾分。」（〈過康齋吳與弼先生墓〉，《白沙子全集》，卷8，頁78上）
- ③⑧ 〈日錄〉：「眼痛不敢看書，暫誦《詩經》，甚覺意味深長。但不敢久讀，爲之悵歎者久之。」（頁27下，172條，45歲）
- ③⑨ 〈即事〉：「養病私欣得自由，日長臥看魯《春秋》。」（卷2，頁9下，39歲）〈讀春秋〉（頁34下，51歲），〈舟近潯陽郭追次辛丑歲遊此詩韻〉：「霜日融融晝夢餘，身閒隨處是安居。萬緣有分無勞計，頻向麟經玩特書。」（卷6，頁22下，71歲）〈讀春秋〉：「塵網那勝久陸沉，青燈邈夜照孤吟。化工妙契何由得，慷慨平生盡筆心。」（同上）〈金沙雜詩之九〉：「寡欲存神妙，忘機養性靈。殘編寒漏永，至教在麟經。」（卷6，頁26上，71歲）

節之詳^⑩。

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了解康齋學問的範圍，以及他對諸家說法的採擇。以《康齋集》印證，〈行狀〉對康齋《四書》學的重點有適切的掌握，而康齋自《孟子》、《中庸》所得似較多。至於《五經》學，從詩作等資料，康齋似以玩味原典為主，從不提各家注疏得失。假如〈行狀〉之說有根據的話，康齋可能只是本於當時流行的版本，未必是有意去取的結果。《五經》中康齋最注意《易》與《春秋》，方法是玩其辭以契於聖心，晚年更多玩《易》的記載。康齋對禮則重視實作，故官學派諸生來習鄉射禮。從康齋多玩味本文及注意感發來看，〈行狀〉捨棄箋註之語應屬可信。「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則反映在他對《近思錄》的重視^⑪。

康齋常提及的書只有數種，雖然由於他的方法是致精以學聖賢，但也因為環境的關係。康齋鄉居且家貧，書籍的獲得當受到限制。前文提及他在其父去世後繼承了遺籍，《晦菴文集》的獲得似在該時^⑫。此外曾去南昌向胡頤庵借

⑩ 〈饒循生辰〉：「風俗固宜由我厚，典章應只在人傳。從今日與二三子，細講高堂十七篇。」（卷7，頁3上，74歲）〈盱江謝郡侯遣鍾掄、潘玉來習鄉射禮。二生歸，裁此以贈之〉：「彌月龍潭講禮回。」（卷7，頁28下，76歲）〈日錄〉有看《儀禮圖》的記載（頁36下，270條，72歲）。

⑪ 以下二詩皆以宋學為孔孟階梯。〈程庸承府主命，李觀光，章取則，皆集小陂，講顏子喟然之章，賦此以勉焉〉：「黃卷有師當自勉，關閩濂洛是梯階。（原注：朱子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卷4，頁2上，61歲）詩〈觀語類後作〉有「平生朱訓不離紳」之言。（卷7，頁12下-13上，75歲）〈自得亭對雨書懷〉：「剛恨平生學聖難，餘齡程課肯容慳。洛閩幸有階梯在，精白斯心日夜攀。」（卷7，頁42下，78歲）

⑫ 康齋四十歲。按：三十五歲時〈上嚴親書〉有「《晦庵先生文集》千萬發回」之言（卷8，頁27上），其父可能仍未寄回。

抄《豫章文集》、《程氏遺書》及《三禮》等書籍多種^{④③}。又曾獲贈書籍^{④④}。可能康齋晚年書籍漸多，故有「晚知書史真有益。卻恨歲月來無多」^{④⑤}之言。

(三)文藝之學

婁一齋稱康齋的述作云：

所爲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風致。〈日錄〉記日功，發自得之蘊。書大小皆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造於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若先生可謂全人矣。（〈行狀〉）

一齋指出康齋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文集與〈日錄〉俱存，筆者認爲其文筆清楚親切而從容，稱其「積中發外，清明峻潔，曲折迂紆」，大概是不錯的。「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的相關作品皆不可考見^{④⑥}，也許晚年多觀書史時頗有些見解，曾在教學時向弟子輩談及吧！關於詩與書法，則《康齋集》中有些材料可以引述。

新詩盡日恣冥搜，塵世悠悠任去留。興到江山隨處覽，不知身外有閒愁。（〈絕句〉，卷1，頁14下）

得詩萬事輕，性達頻爵躍。翹首吟未迴，松風度寥廓。（〈道中作之

④③ 〈承大司成先生惠豫章文集，抄錄已完，偶成鄙句〉（卷3，頁3上，52歲），〈拜頤庵胡祭酒先生書〉：「擬明春來親德音，攜數生，拜假《程氏遺書》及《三禮》諸書抄錄。」（卷8，頁37下）

④④ 〈寄謝楊憲副贈周禮註疏〉（卷2，頁33上，51歲），〈王錦衣贈梅聖俞集〉（卷5，頁16下，68歲）。

④⑤ 〈日錄〉頁32上，214條，65歲。又如說：「日親聖賢嘉謨，何幸如之！但恨讀之晚矣。」（頁40下，314條，78歲）詩〈小兒初度〉則有「几閣群書日似年」之句（卷7，頁18下，75歲）。

④⑥ 康齋少年在南京曾學星象，〈冬夜步月懷劉悅學先生〉：「恍思玩《易》京師夜，曾向吾師學看星。」（卷2，頁10上，39歲）

八〉，頁19上）。

日淨風暄清晝遲，綠陰啼鳥夢醒時。閒窗筆硯無塵雜，幽事宜人又得詩。（〈晝寢覺〉，卷1，頁21上）

康齋刻苦力行，崇拜程朱，看他的詩作，才知他對詩亦極愛好。看前二首，他可以花上整天的時間搜索詩句，一旦得之便雀躍不已，閒愁都忘。第三首晝寢醒時得詩，倍覺襟懷曠遠，可知他的枕上功課也包含了平易和樂的一面。以下再舉一些詩題或詩句，可以發現康齋對唐詩有一定的熟悉，而成爲生活上固定的興趣。〈除夜次唐人詩韻〉（卷1，頁30上，31歲），〈東窗誦陶詩〉（卷2，頁4上，36歲），〈蘇州絕句次唐詩韻二首〉（卷4，頁11上，63歲），〈過吳江縣〉：「一棹吳江上，寒烟楓落時。無才堪賦詠，聊誦古人詩」（同上），〈宿白沙吳瑀氏之二（時瑀任陝西都司斷事）〉：「令弟從官去，難兄好客深。青燈白沙夜，詩律細論心」（頁26下），〈渡黃河次唐人昨夜微霜初渡河韻〉：「平生踪蹟半樵歌，歲晚昏眸始識河」（卷5，頁13下，68歲），〈平野望鄒魯次少陵韻〉（頁15上），〈旅夜次工部落日平臺韻〉（頁23上，71歲），〈小憩下窯寺竹裏〉：「會心不覺孤吟久，信是閒中日月長」（卷7，頁25下，76歲），〈至日次杜韻〉（頁29上）等。而陳白沙也說他「吟殘老杜詩千首」（參註⑳）。

假如康齋提及的詩作只是這些，我們的結論將是：他一方面有理學家的嚴肅躬行，一方面也有詩的陶養調劑，使其人生溫潤柔和，不致於偏枯僵硬。但筆者以爲詩對康齋有更大的作用，茲從康齋提及邵康節及朱子詩之處來討論。康齋對康節朱子詩甚熟且極爲崇拜，觀下引可知。〈夜讀康節先生詩後作〉（卷1，頁36下，35歲），〈誦晦菴詩次韻〉（卷2，頁12上，39歲），〈苦熱觀晦菴詩集〉（頁14上，40歲），〈應林道中奉懷紫陽夫子〉：「昔誦夫子詩，今履夫子路。夫子一去夜漫漫，往復行人自朝莫」（卷4，頁26上，66歲），〈安仁道中奉懷紫陽夫子〉：「此爲正岸東行路，高句藏心亦有年。今

日偶來親舊蹟，七閩惆悵白雲邊」(同上)，〈舟中獨坐次邵詩韻〉(卷6，頁18下，71歲)，〈琴罷歌邵子詩〉：「美茲明月清風夜，細唱陽春白雪歌」(頁22上)，〈又絕句〉：「石炭紅生夜正遲，銀燈花爛未眠時。客身無恙心虛寂，細寫閩山性命詩」(卷7，頁11上，75歲)，〈和康節清風吟〉：「長短高詞播大篇，誰知妙處在無言。微涼一動煩歎外，流水桃花共杳然」(頁26下，76歲)等等。

康節、朱子詩是理學詩中最佳者，康齋的愛好自無足怪。但康齋並不視康節、朱子為詩人，而是在對聖賢人格行事嚮往的主題下，將詩視為聖賢言行的一部分。詩是感興而非說理，因此理學家雖有不少作詩的，但聖賢之學則不求於詩。然而康齋不太區分詩與聖學，前文曾徵引說明他不論自學與教人，詩與聖學常各佔一半。其中關鍵在康齋的聖賢之學並不重理論思辨，而重在對聖賢人格、風格、行事深入的認識與體會，這時重具體形象、起人感興的詩不僅不應忽視，且當作為契入聖賢境界的媒介了。

由此言之，康齋的理學在相當的程度上採取了詩的方法，這方法能契入一些在理學上有重要意義，但不屬於思辨的題材。以下試舉例說明，〈對月偶成〉：「夕陽扶杖步前庭，歸踏繁陰霽月清。靈府偶然無一物，靜中意思驗周程。」(卷4，頁36下，67歲)。濂溪不除窗前草，以觀自家意思，襟懷如光風霽月，這種境界實在無關乎論辯，朱子用「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的讚語來描述^{④7}，康齋則在清朗的月夜感到自家意思與周程一般，而賦詩詠歌。〈觀語類為政以德章感程子而作〉：「尤人只見無虛日，罪己何曾有實功。莫把寸心

④7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二程全書·遺書》卷3，頁2上，21節)「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近思錄集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卷14，頁4上引)朱子語見《六先生畫像贊》《朱子大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85，頁9上。

矜立雪，但專一味暮春風。」^④（卷7，頁31下，76歲）此詩將二程風格相比較，而認為為政當如明道的春風，化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即事〉：「灌罷時蔬又坐亭，游魚潑潑沼澄澄。天光雲影徘徊處，誰共當年一鑑情。」（卷7，頁36上，77歲）此詩明顯地把庭園的池塘比擬為朱子〈觀書有感〉詩的「半畝方塘」，而歌詠天機活潑的意味。〈臥自得亭〉：「養病時來沼上眠，託身物外自悠然。區區為幸誠多也，隨處先師有格言。」此詩緊接上首，同樣在池邊感到生活的趣味，而宋儒的格言幫助他領會人生意義與活潑天機。格言是詩化的義理，讀格言不是論辨義理，而是玩味義理而體會理境。康齋對程、朱著作，邵、朱詩作皆視為格言，而他自己也常作格言，如〈日錄〉中「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天意順時為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等條（頁34下，243–245條，70歲），甚至其詩作也可視為格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康齋哲學的重要方法。

詩的佳處在寫出事物的本相。〈宿漸嶺〉：「漠漠暮林橫綠野，澄澄秋水映紅雲。遠來客舸依沙岸，獨犬一聲何處村。」（先生跋云：「此辛丑（1421）歲歸自武昌詩也。閱稿見之。因感此景何處無之，然必心中無事乃能見也。」）（卷1，頁26下，31歲）對於此跋，須參考〈日錄〉：「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蕙風徐來，而山林闐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可識青天，於斯可驗。」（頁3下–4上，12條，35歲）康齋以詩寫景，但能寫出真正的自然，是心地修養的表現。道便是真正的自然，和詩與修養都相關。這是理學中，從邵康節經吳康齋到陳白沙一路所建立的傳統。

^④ 「朱公揆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二程全書·外書》，卷12，頁7下，64節）

詩（以及格言）的方法是進入理學義理的一個門徑，康齋可作為成功的典範。但同時也須知道這種方法的限制。詩將義理具體化或形象化，成爲一種境界，但論辯才能展開義理，從而開出新境界的可能，這是康齋所欠缺的。康齋終於只是體會宋儒的義理，而沒有向前發展。除了思辨的停滯之外，這種方法的更大危機在境界容易虛而不實。康齋所體會的境界是真實的，因爲他真誠的志於聖賢，不事紛華，在逆境中努力於德性主體的建立。但假如缺乏道德的努力，便侈談道德的境界，將有流於虛浮的危險^{④9}。

除了作詩，（〈行狀〉）又指出康齋擅長書法。這種亦作些引證。

〈日錄〉：「七月五日，日臨鍾帖，明窗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⑤0}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頁22下，130條，40歲）〈東窗偶成〉：「法帖謾陶閒裏趣」（卷2，頁16上，40歲），可能同指臨鍾帖之事。

康齋爲人題字，如〈以石竹雪竹諸字贈周余諸友〉（卷2，頁47下，51歲）。如贈霜松二大字（〈寄嚴州劉太守〉，卷5，頁10上，68歲）、正直二大字（〈贈伍御史〉，同上）、贈蘭雪二字給徐希仁（〈贈鄭御史〉，頁11下）、冰壺二大字（〈贈金通判〉，頁23上）。又爲人題扁額，如〈宿鄭氏村居〉：「依稀餘墨象湖傍（原注：堂扁拙筆存焉）」（卷6，頁43上，73歲）、〈合橋鋪之一〉原注：「爲寫紫蓋峰、栖鳳堂、清風亭額」（頁45下）。

^{④9} 晚明的清言小品也是以格言談義理，龔鵬程先生指出了優美辭藻背後虛浮的一面，與康齋的篤實恰成對照，故俱引於下：「一位慧業文人，雖感聖賢境界之美，心嚮往之，但終只能談說觀賞玩味之，只能以一種文學藝術的態度去品鑒。在此談說觀玩之中，他們彷彿即已獲得心靈的洗滌，明白了人生情識所執著者畢竟爲虛空不實之存有，然而所挹獲者，實乃非聖非凡、在聖凡之間的美感趣味而已。」（《晚明思潮》，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243）但從社會教化的功能與自覺而言，清言小品的創作未嘗不是積極嚴肅的，其意義還可重估。

^{⑤0} 〈日錄〉又常有「親筆硯」之語，似皆指寫字。見146、216、217、315各條。

陳白沙有一段關於康齋詩真蹟的記載：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1469）春三月，行李出北京，是日次於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一見驚絕，閱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某憐之，割一紙。（〈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白沙子全集》，卷2，頁15上）

白沙下文云「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這自然是其真蹟珍貴的主因，但詩與書法應該也受到重視。

前文曾論康齋勿忘勿助、道理平鋪之說是白沙的前驅。其實康齋對詩的重視，通詩境理境為一，也開白沙之先。此外，兩人皆擅長書法。文藝的愛好是天性，無所謂繼承，但兩人皆注意文藝的義理價值，而不視為玩物喪志，應該說師生之間有啓迪的關係。

（四）經世之學，附論康齋出處問題

康齋一生在鄉村讀書講學，極少談論政治問題。六十八歲時應聘入京，不久即還。放歸田里前，有〈陳言十事〉，舉出十件政治上的大節目，並引宋儒格言為證。但理學家的政治綱領總是差不多的，要理解康齋較獨特的觀念，仍須勾稽其他材料來看。

康齋強調道德對政治的積極作用，〈日錄〉言燭影事，深為宋太宗惋惜，以為「人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方做得堯舜事業。……學者須當隨事痛懲此心，剷割盡利欲根苗，純乎天理，方可語王道。」（頁1下，3條，35歲）可知他主張的是基於君主個人道德的王道政治，這完全是明道有天德然後有王道的思想^⑤。王道沒有聖學的修養，康齋認為他功業甚卑（

^⑤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論語精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朱子遺書》本卷5上，頁18上引）

〈日錄〉83條)。康齋〈追和劉秀野詩韻之六〉：「我思君子爲，洪鈞豈小補？化日舒以長，仁風被寰宇。下視驩娛如，區區焉足數。安得千載人，誰知此心苦？」〈之七〉：「王者大如何？乾元物資始。亭毒一何心，家家自桃李。固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帝力何有哉？皞皞皆仁里。」（卷2，頁38上下，51歲）兩詩皆是對王道的形容，本於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盡心上·13章）之言。

《康齋集》卷九有家譜、族譜五十五篇，數量驚人，值得重視。明代是中國後期家族制度發展至完成的階段，家譜、族譜是家族制度的要項之一，明人文集多有家譜、族譜序，正反映了制度的發展。康齋對此有推動的作用。「自予居種湖，郡庠來游之士各修其譜，予皆不辭而序焉。」（〈樟溪王氏家譜序〉，卷9，頁10下）康齋弟子紛紛修譜，想來康齋在其間必有鼓勵推動的力量。至於康齋這些序中所表現的思想，首先，以爲有德可以興家。「雖貿爾田，必教爾子以詩書」（〈大塘胡氏族譜序〉，頁2下），「盛衰靡常，惟德是視」（〈蘿谿胡氏族譜序〉，頁4上、下），「族之興在夫尚德者衆，則觀感者深，而尤在夫兆之者之厚其躬也」（〈韓家嶺周氏族譜序〉，頁9下）。其次，強調祖先偉大人格鼓舞後人。對呂子約的後代，他說：「嗚呼！秦漢而後，繼孔孟絕學者，程朱氏而已。而申公父子際程，成公兄弟際朱，千載一時之慶，重萃呂氏一門，何其盛哉！予小子猥以不腆之辭廁名芳籍之末，又何幸歟！而子孫能不興起其仰止之心，而激昂其修德之志也耶！」（〈呂氏族譜序〉，頁20下）

婁一齋謂：「歲凶，餓莩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灌蔭溝池，久堙爲田，率鄉人開墾修築之，人有所賴。」（〈行狀〉）這是鄉紳所能做的經世事業，錄以參考。

康齋的學問方向是身心性情與日用常行，對經世博文較不注重，但這是否和康齋本人的政治態度有關？有學者指出康齋因爲抗議靖難之變而棄科舉，並

且疏遠其父^②，是否如此呢？此處僅就筆者所知羅列一些事實於下，以供讀者參考。

康齋自言棄科舉的理由，是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不滿世人爲了「言語文字之工，功名利達之效」（〈厲志齋記〉，卷10，頁1下）而學。由康齋努力於聖賢之學的事實來看，此志真切，當是棄科舉的主因，政治態度或者是助緣，但把助緣當成原因，未免把聖賢之學看得容易了。至於父子關係的問題，康齋父吳溥（1363-1426），建文二年（1400）會試榜首，殿試第四名。康齋十二歲（建文四年）赴京從父，即成祖攻下京城之年。其父時任國子司業，靖難後繼續舊任，後爲翰林檢討。康齋與其父曾有緊張的關係，三十一歲〈上嚴親書〉云：

及年十八九，雖略知讀書，志氣太銳，自謂古人不難到，每輕前人，忽慢行事。大人雖時時切責之，而其狂妄之心終不能改。年二十一回鄉，粗涉人事，然後漸知力行之果不爲易，又天之所以拂亂其所爲者恆極其至，兼以疾病纏綿，茫然不知道路所由，安得而順乎親哉？身雖隔千里之遠，而夢魂無一日不在於親之側也。每中夜痛心，罪不容於死。去年六月來侍，冀得一面親顏，盡告十年所歷，思自奮於後日，而罪惡貫盈，親心未回，抱痛還鄉。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信如窮人無所歸也。（原注：去歲古崖不知以何事拒先生，先生負罪引慝，早暮號跪累日，終不納。是年冬，先生復往省，古崖感先生純孝，父子如初。）（卷

^② B. A. Elman（艾爾曼）認爲康齋拒絕參加科舉，因爲不願事奉篡位者永樂帝，此種排斥使他與父情疏。見“Ming Classics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Duke of Chou”，林慶彰、蔣秋華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又參考陳榮捷說，見Wing-tsit Chan, “Chu Hsi School in Early Mi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43-46。金仕起〈略論吳與弼思想特質的形成〉《史繹》21期，頁1-28。

8，頁13下-14上)

玩味此段文字，康齋志學以來，似乎有多年不順乎親，主要是他年輕時有狂氣，與俗相忤，因而不得其親的歡心（參看前文「聖賢之學」節），當然，棄科學的作為令父親失望，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從康齋的悔罪怨艾來看，父子情疏決非其本意。三十三歲〈上嚴親書〉（頁26上-28下），康齋自述進學，並勸其父將諸弟遣回家鄉，以習知稼穡艱難，這時已不見親情睽隔的情形了。假如康齋棄科學有靖難抗議的成分，也不致於把這種不滿擴張到親情上，否則真成爲所謂陳仲子之義，有違人情了。

康齋師楊溥（1372-1446），建文二年進士，永樂初，侍皇太子爲洗馬。十二年，帝征衛拉特還，東宮遣使迎帝遲，帝怒，將侍太子諸臣下獄，溥亦在內，繫獄十年，仁宗即位始釋出獄。宣宗立，入內閣。英宗正統三年，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⑤③}。康齋五十一二歲曾赴南昌訪胡儼頤庵。胡儼，洪武舉人，任教諭、知縣。建文四年，練子寧薦於朝，成祖即位，授翰林檢討，永樂二年九月，拜國子監祭酒，居國學二十餘年^{⑤④}。楊溥與胡儼皆受惠帝提拔而改仕成祖，康齋並不因此對他們不敬。就算康齋對靖難本身不滿，我們也很難將不滿的解釋擴大到改仕成祖的其父其師身上。然而，成祖是暴虐的，不僅在攻下京城時大殺惠帝諸臣，事後還繼續清算投降不徹底的臣子^{⑤⑤}，至於楊溥則因成祖怒太子迎駕遲緩而受累下獄。康齋一生雖只做耕讀的學者與教師，但他並不是農家子出身，而是有身爲會元與國子司業的父親，位居宰相的老師，也看過政治的風暴。他對政治應該有相當的敏感度，因此不去惹做官的風波。假如說康

⑤③ 《明史·楊溥傳》（臺北：藝文印書館），卷148，頁12下-14下。

⑤④ 同前註，卷147，頁13下-15上。胡儼與吳溥當有一段時期同事，故康齋往訪之。

⑤⑤ 參考《歷代通鑑輯覽》卷102，成祖永樂二年十月「籍長興候耿炳文家」，三年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七年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八年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十年二月「削遼王植護衛」諸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齋因政治原因而不肯出仕，則應求之於此等處。

《康齋集》有〈回憲司經歷書〉、〈回清漳王太守書（正統己未，1439，49歲）〉（卷8，頁32下-34上）皆是辭薦之書。《明儒學案·崇仁學案一·吳康齋傳》云：「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為？』」天順初，受石亨薦，一出遂還。〈傳〉云：「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筆者以為這些記載是符合康齋的情況的。

康齋對靖難事件本身不曾表示態度，但從原則上說，則必然是反對的。康齋少數論政的文字都指出有天德而後有王道，要求為政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如前引文可見。但這種有天德而後有王道的思想只是原則上的，似不致擴展到對整個明朝廷及政治的否定。《康齋集》中反映出一個雖貧窮卻安定的時代，康齋對於政治有其眼光與戒慎，但不至於像伯夷叔齊般的否定整個朝代。

然而從他對聖賢的追求以及以王道為政治標準來看，他無疑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前文已引及他青年初回鄉的幾年與俗相忤，「或謂之僻，亦謂之怪，笑讓兼極」（〈與章士言訓導書〉）。在他多年的努力後，能展現出人格的光輝，至於「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陳白沙〈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但一些線索反映了其心深處還是寂寞的。

讀韓子〈與李翱書〉，大有感於吾心。（〈日錄〉頁28上，174條，45歲）

〈與李翱書〉寫於貞元十六年（800，韓愈33歲），是時韓愈往依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書中韓愈表示不願返京師，因為「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至於依張建封亦有所不得已，書云：「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

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韓愈甚至認為自己處境之難，過於顏子。書云：「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⁵⁶康齋深有所感，必然是韓愈的貧困、不被了解、無所依歸，深深地打動了他。若然則康齋本人實有很深的寂寞感。

假如那是中年家貧道未大行時的反映，那麼還可舉出晚年的材料。

曾服前賢孤立辭，空山獨夜感於斯。何由得拜龍門道，一寫平生慨慕私。（〈宿白雲庵感懷〉，卷6，頁32上，72歲）。

程子云：「天地間可謂孤立。」（〈日錄〉，頁39上，297條，78歲）

程子全言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二程全書·遺書》，卷2上，頁9上，86節）程子前後各條皆評論佛學，此條應亦就佛學盛行對儒學造成壓力而言，但在康齋則用來表達在眾人中獨行聖賢之道的感受。雖說康齋「道德名譽傾一世」，但對一位真誠學習與推行聖賢之道的人，耕耘一生之後，驀然回首，還是覺得自己的成就是多麼的少。他所能依賴的只是真誠不懈的努力，以及聖賢的典範了。

四、結 語

以上，筆者主要根據《康齋集》對康齋生活及學術的各方面做了一番敘述。康齋在各方面的表現是單純樸素，本文亦以資料為主，因此在結語時似亦不勞將要點再複述一遍。此處僅舉出康齋治學做人的一些啟示，做為結束。

一、康齋的學說並不深奧，但把明學帶入精微的陳白沙、精深博大的理學

⁵⁶ 以上引文及考證，參考《韓昌黎集》，頁104-105，《韓愈研究》，頁54-57。

殿軍劉戡山都極崇拜他⁵⁷。這點告訴我們聖賢之學不在高深的理論，而在真誠不懈地建立與推廣自己的人格，所謂學不厭教不倦。康齋自以為孤立於天地之間，然而經過多年的誠實努力，卻真能自立其間，不為富貴貧賤所遷移，此點絕非易事。

二、康齋「一稟宋人成說」，甚至也沒有完整地敘述宋人的理論，而只是複述程朱的主敬窮理說，以及見獵心喜、窗前草不除、孤立等話題。然而通過真誠的學習與深入的體會，卻使這些話題都帶著新的生命，康齋據此而在「文詞訓詁、功名利欲」的包圍中恢復了宋學的生機，開啓有明一代的理學，對白沙所稱的「一代人豪」，是當之無愧的。

三、康齋是理學家中詩作較多的一位，也是認真從事的一位。筆者認為詩對他不是著作，而是生活記錄，所以除了寄情遣興，相互贈答外，尤多記遊之作。康齋詩集經編年，成為考訂其生平及思想、感情的極佳材料。康齋的聖賢工夫，有一部分可稱為詩的方法，明白這點，應該有助於掌握宋明理學一部分的特質。

附錄：康齋略譜⁵⁸

⁵⁷ 劉戡山對康齋的評論，簡括了本文對其聖賢之學的敘述，最後並致崇仰之意。具引於下：「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泰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為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明儒學案·師說》）

⁵⁸ 楊希閔編：《明吳康齋先生與弼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用〈行狀〉、〈日錄〉及少數其他文章為材料。事實上，不僅《康齋集》其他文章尚多可用者，還有大量編年的詩作，是考訂康齋行履的極佳材料，楊氏卻幾乎全未利用。康齋年譜可以重作，但本文目的不在此，僅列出重要行事以供讀者參考。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1391）十二月十四日，康齋生。

二十九年丙子（1396），六歲。

入小學。（〈與章士言訓導書〉，卷8，頁16上-18下）誦詩書，啓蒙師或爲同族叔父。〈丁丑元日〉注：「記先君詩云：夢社方五歲，已解誦詩書。兄弟恩雖重，師生禮必拘。齋居應密邇，路徑不縈紆。由此能勤學，終當作大儒。」（卷4，頁31上）

三十年丁丑（1397），七歲。

學對句。（〈與章士言訓導書〉）

惠帝建文四年壬午（1402），十二歲。

隨伯父至京省父，即留居京^⑤。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1403），十三歲。

丁周太夫人憂^⑥。

成祖永樂四年丙戌（1406），十六歲。

學詩賦。（〈與章士言訓導書〉）

六年戊子（1408），十八歲。

學舉子業。（〈與章士言訓導書〉）

七年己丑（1409），十九歲。

讀〈伊洛淵源錄〉，始志於聖賢之學。

九年辛卯（1411），二十一歲。

父命還鄉授室，妻爲五峰陳氏。

十年壬辰（1412），二十二歲。

⑤ 此據〈上嚴親書〉，卷8，頁13上。據〈行狀〉及〈務東周氏譜序〉（卷9，頁18上），至京省父在十歲。

⑥ 〈務東周氏譜序〉：「與弼十歲別母京師遊，又十歲歸，母卒七寒暑，踣地號天墓側，欲絕不能。」（卷9，頁18上）則其母約卒於此時。

居石泉^{⑥①}。（〈行狀〉）此後數年，康齋似常在外遊歷，可能是教書度日^{⑥②}。

十七年己亥（1419）二十九歲。

本年及次年，先生居五峰外家，詩中稱為「客館」或「甥館」^{⑥③}。胡九韶從學或在此時，有〈閱九韶吟稿〉（卷1，頁10上）。

十九年辛丑（1421），三十一歲。

讀《四書》有得。

二十一年癸卯（1423），三十三歲。

小陂新居經三年經營，部分完成，先行遷入。〈暫宿新居〉：「辛丑杪秋中，相基蒙古卜。明年閏月冬，於焉結新屋。癸卯建未初，移居遂所欲。」（卷1，頁33上）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1425），三十五歲。

進學甚力。〈日錄〉克剛忿有得在此年。〈觀舊稿〉：「十載飄零無定

⑥① 〈行狀〉「石」作「實」。按，詩題有〈……曩在石泉時，東窗對一鉤之月……〉（卷4，頁33下），〈日錄〉：「意初回鄉時石泉柱帖云：欲到大賢地，須循下學功。回首近六十年矣。」（頁41下，324條，78歲），則作「石」為是。

⑥② 如云：「客久無違性」（〈讀罷〉，卷1，頁7下，29歲），「客邊微恙在」（〈簡戴錦舟先生〉頁8上）。又，據〈懷舊〉：「意曾彌月寓東坪，童冠相親八九朋。」（卷2，頁15下，41歲）〈病中倦臥，偶思年二十四時寓居東坪，與諸生夜讀，賦玩月詩，微吟一過，神思洒然，遂次舊韻〉（頁17下），知他在二十四歲時曾去東坪教讀彌月。又〈同安李氏家譜序〉：「永樂丙申（按：1416，26歲），予省覲太學，次同安傳舍，聞孫思誠招致南莊之上，以教其二子性之宜之。」（卷9，頁27上）說明了其青年時代的客遊與教學的關係。其出遠門，除省親金陵外，三十一歲時曾去武昌，參看〈上嚴親書〉（卷8，頁14上）及〈宿漸嶺〉詩注（卷1，頁26下），在武昌亦與諸生講學，〈與黃景章教諭書〉：「近無便舟，因鄉人而至大冶，寓於普濟寺。寺極幽曠，學中師友日相往來。永嘉朱廣文老成可親，諸生亦多純樸，寺僧能禮儒者，亦客中一勝事。」（卷8，頁22下）

⑥③ 參看〈胡十見訪客館〉（卷1，頁20下，30歲）。〈甥館〉（卷7，頁23下，76歲），〈初五日〉（頁24上）。〈中秋玩月次舊韻〉（卷7，頁42下，78歲）。

棲，兩年幸隱此山扉。詩書漸覺添新得，心性還應勝舊時。」（卷1，頁38下）

洪熙二年丙午（1426），三十六歲。

丁父憂。（〈行狀〉）

宣宗宣德三年戊申（1428），三十八歲。

居憂，十月服闋。居小陂。〈遷居小陂〉：「七載經營今陟居。」（卷2，頁6下）

正統五年庚申（1440），五十歲。

居種湖祖基。（〈行狀〉）〈贈故里親友〉：「跋涉西還訪舊居。」（卷2，頁31下）〈奉謝諸鄉鄰〉：「草堂遙復種湖濱。」（頁32下）

正統六年辛酉（1441），五十一歲。

居種湖。冬，赴南昌爲半月之遊，拜望國子祭酒胡儼頤庵（1361–1443），有〈洪都稿〉（卷2，頁40上–46下）。

正統七年壬戌（1442），五十二歲。

春，再赴南昌抄書，有〈洪都抄書稿〉（卷3，頁1下–5下）。冬，復居小陂。

正統十三年戊辰（1448），五十八歲。

婁諒一齋來學，有〈贈婁諒歸上饒并序〉（卷3，頁20下）。

代宗景泰四年癸酉（1453），六十三歲。

因求醫至南京，經浙江返家，有〈游金陵稿〉（卷4，頁4上–17下）。

景泰五年甲戌（1454），六十四歲。

胡居仁敬齋來學（〈年譜〉），陳獻章白沙來學^④。

④ 〈書玉枕山詩話後〉：「予年二十七（按，即景泰五年），遊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白沙子全集》，卷2，頁18上）

景泰七年丙子（1456），六十六歲。

出遊上饒，有〈適上饒稿〉（卷4，頁21下-29上）。

英宗天順二年戊寅（1458），六十八歲。

去年十二月，行人曹隆奉詔起先生於家。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四疏辭職而後允。遣行人王惟善送歸。有〈金臺往復稿〉（〈行狀〉）。

天順五年辛巳（1461），七十一歲。

冬，赴楚拜舊師楊溥弘濟（1372-1446）墓。有〈西遊稿〉（卷6，頁16上-29下）。

天順六年壬午（1462），七十二歲。

春，赴閩建陽考亭書院瞻拜朱子。有〈適閩稿〉（卷6，頁30下-37上）。

天順七年癸未（1463），七十三歲。

七月，先生應聘時京師舊友張永任嚴州太守，先生因出遊朱子婺源祖居，訪張永，遊嚴陵。有〈東遊稿〉（卷6，頁40上-48下）。

成化元年乙酉（1465），七十五歲。

冬，出遊饒州，有〈東遊饒州稿〉（卷7，10上-17上）。

成化五年己丑（1469），七十九歲。

十月，病卒。

吳康齋的生活與學術

鍾 彩 鈞

提 要

吳與弼康齋（1392–1469）為明代理學開山人物。本文以全部《康齋集》為依據來考訂其生活與學術。在生活上，對其勤學、教學、農牧、閒逸與出遊有詳細的描寫，以見其一生學不厭教不倦，超脫艱困而得生活之趣的高尚人格。在學術上，則分聖賢之學、書本之學、文藝之學、經世之學各方面來論述。在學問上康齋雖只是複述程朱的主敬窮理說，以及一些生活性的話題，然而他卻能深入體會其中的意味，並將心提升為核心概念，從而開啓有明一代的理學。康齋在理學家中詩作較多而且認真，詩是其學與教的重要項目，而他對宋儒意境的體會也接近於詩的方法。

The Life and Learning of Wu Yu-pi

CHUNG Tsai-chu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life and learning of Wu Yu-pi (1392–1469), the founder of Ming Neo-Confucianism. Tak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Wu Yu-pi* as a basis, the author extends his study to the whole scope of Wu's life and learning. Concerning this thinker's life, the author describes in detail Wu's diligent study, tireless education, peasant and shepherd life, and leisure and travel, in order to show a noble character who insisted on life-long study and teaching, and transcended hardships to taste the joy of life. As for learning, the author discusses Wu's research into sages, books, belles-lettres, and practical affairs. In philosophy Wu achieved no more than to reiterate "holding fast to seriousness and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some practical instructions for living from Sung Neo-Confucianism. But through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his elevation of mind-heart to the central place of philosophy, he originated Ming Neo-Confucianism. Among Neo-Confucianists, Wu is the one who composed poetry diligently and abundantly. Poetr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his study and teaching. In some cases, his approach to the meaning of Neo-Confucianism may be said to be a poetic method.

Key words: Wu Yu-pi Ming Neo-Confucianism